

目 录

人 物 志

- ① 中国影剧事业拓荒者郑正秋……………黄更生 (1)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陈景明 (5)
水利战士——钟煌高……………郑白涛 (17)
热心公益事业的实业家郭子彬……………张观澜 (19)
清末翰林郑邦任……………郑钟固 林晓光 (23)
近代名贤郑浩……………郑有涯 (25)

侨 胞 纪 事

- 同盟会会员陈美堂……………郑白涛 (28)
爱国爱乡悉力以赴
——记蔡泰华侨前辈陈耀衡……………陈 民 (30)
爱国侨领郑子彬……………林晓光 江 伟 (32)

革命斗争史

- 华阳锄头吓退九县官兵……………郑儒新 (35)
峡山农民自卫军……………马哲民 (37)
古埕人民的抗日战争……………郑 生 (40)

诗 词 篇

- 忆潮阳 (组诗) ……………陈以我 (42)

旧制沿革

- 清末民初的潮阳教育……………张观澜 (44)
解放前棉城女子小学和义务初级小学
……………郑辅宣 郑传宗 (52)

名胜古迹

- 沙陇五畝古寺记胜……………林晓光 (54)
北山亭轶事……………林湘雄 (56)

地方风物

- 京北古渡今昔……………郭亨渠 (58)
棉城河今昔……………林 越 姚少宏 (60)

中国影剧事业拓荒者郑正秋

黄更生

①

一

我国早期话剧、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郑正秋先生（1888.12.24——1935.7.16），祖籍广东潮阳县成田镇上盐汀村人，原名伯常，号药风，正秋是他的笔名。他自幼随父母客居上海，十四岁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幼聪慧，弱冠挥笔成文。辛亥革命后投身于影剧事业，致力于评、编、导、演、唱、摄制，勇攀影剧艺术高峰，历廿春秋，呕心沥血，拓荒树帜，为创影剧业而立伟绩，是中国影剧界一代名师。

二

清末，朝政腐败，正秋服膺孙总理训导，鼓吹革命，深知欲复兴民族，必先唤起民众！于是粉墨登场，毁家而兴话剧，为革命而献艺终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掀起新文化运动，同封建反动思想作斗争。正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戏剧为改革社会，教育民众的手段，先后于《民言》、《民呼》、《民吁》、《民主》等报刊上，发表以评皮簧戏为主的“丽丽所剧评”，主张改革旧戏，提倡新剧，并评击当时腐败政治，深得于右任赏识，曾应于右任之约于《民立》报副刊发表《粉墨场中的杂货店》一文，指出：“戏剧者，社会之实验场也；优伶者，〔注1〕

• 1 •

社会教育之良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无如吾国优伶，自知负绝大责任者，实鲜！而戏剧进化于以迟钝不前矣，是以非有文学士出身而更始不可。”郑先生的文章，有力地揭露旧社会、旧道德、封建礼教的罪恶；既批判纯艺术自然主义，又反对视戏剧为茶余饭后消遣娱乐品。因而风波骤起，遭到当局蛮横干涉，先生却泰然置之。世人赞先生为“不畏强暴之剧评家”，其战斗精神，难能可贵。

三

先生一生不可磨灭之贡献是：当俗人视影剧为娱乐消遣品之时，他却把影剧当作改革社会，教育民众之良好工具，坚持着“寓教于乐”的进步观点。

基于这一点，先生著功于新剧，一九一六年编哑剧《隐痛》、《皇帝梦》，亲自登台演出，揭露袁氏罪行；一九二五年创作《孙中山之死》，并亲自扮演孙中山，获得好评，轰动剧界。

继天一影片公司之后，先生与同仁张石川、郑鹧鸪、任矜苹、周剑云诸君合资创明星影片公司，并始创明星新戏学校，任校长，培养人才，拓荒创业，耗精沥血。那时候，他的优秀剧作很多，皆着力于揭露封建制度，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妇女，给予深切同情的“社会片”，如《难夫难妻》、《玉梨魂》、《最后良心》等。

一九一三年他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写了《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与张石川联合导演，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片。该片以家乡买卖婚姻为题材，写一对青年男女在旧式婚姻制度下之不幸，从而抨击封建婚姻的不合

理。

《玉梨魂》以带泪的笔调，描写了年轻寡妇梨娘之悲剧，深刻暴露杀人的旧礼教的罪恶。《最后良心》则是写童养媳，招女婿，抱着“神主牌”成亲之罪恶婚姻习俗，是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正秋先生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先后编导《自由之花》、《姐妹花》、《再生花》三部电影名著。晚年抱病之杰作《姐妹花》，更是著称于世。时过五十年后的一九八二年，《姐妹花》在意大利上映，仍博得外国朋友之好评，轰动国际影坛，同年又在沪上映，连续两月满座。该剧描述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遭遇：失散十年，姐妹俩一个当上“贵人”，一个变成“犯人”，“贵人”二宝霸道骄奢淫逸，“犯人”大宝善良温驯遭害；作者把两姐妹的不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观后教人叹服先生之艺术功力。该片由著名明星胡蝶一人扮演大宝、二宝二角，先生亲自导演，胡蝶出众的演技，更使《姐妹花》名贯影史。

四

人生有限，艺海无涯。老辈名家把培育新秀视为己任，正秋先生对此更是不遗余力。伯乐相马，心血育苗，师良高徒出，桃李遍天下。

先生之高足蔡楚生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是与先生的培育分不开的。蔡楚生是潮阳县铜盂镇神仙里人，家贫，仅念四年私塾而失学，酷爱艺术。一九二七年只身抵沪，于几家电影公司当杂工、临时演员，结识了正秋先生，先生见楚生天资聪颖，有志有识。遂以乡谊荐楚生于明星影片公司，自此得先生精心培养，在协助拍摄《战地小同胞》，《血泪黄

花》等片时，深得先生谆谆教诲。后入联华影片公司独立编导，更是才华横溢，编导了举世闻名之《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渔光曲》于莫斯科电影节献映，获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之影片，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也。

胡蝶女士从普通影校学生、演员，成为著名明星，荣获“影星皇后”之美誉，皆先生苦心培养、授艺的结果。胡蝶于一九三九年应邀出席莫斯科国际电影博览会，誉载寰宇。胡女士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吾之成就，皆郑老夫子培育之功也”。

正秋先生一生致力于影剧事业，拓荒创业，鞠躬尽瘁，积劳成疾，经常咯血，仍抱病工作，终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辰刻于沪病逝，享年仅四十八。噩耗传出，上下咸悲，惜一代巨匠之早逝！八月廿五日由明星影片公司暨中国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等三十余团体联合发起，召开郑正秋先生追悼大会。是日，各界名士数千人沉痛哀悼，素荷师恩后秀，顿失良师，悲痛涕泣，胡蝶等一班著名影星，虔诚亲扶灵柩，夹道民众默哀。恩师伟绩垂青史，白衣如雪哭先生。可见人民群众对我国影剧界一代名师之崇高敬意！

作为潮阳人，对华夏影剧界巨星的殒落，更是痛惜万分！

时至今天，正秋先生仙逝已有半个世纪，但我们心中仍有阵阵隐痛！

正秋先生是潮阳的儿子，正秋是潮阳人的骄傲，潮阳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注1.〕优伶——戏曲演员之旧称。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

陈景明

名闻中外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虽然离开我们快二十个年头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许多著名力作，仍象金子一样，闪闪发亮。他从事电影创作和电影事业领导工作四十年，自编自导和与他人合作编导的影片一共二十六部，创作电影剧本、短剧十二个，还写了一批有影响的电影理论和评论文章。他自己编导的《渔光曲》，参加了苏联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一九四七年和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战后中国电影发展的里程碑”。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泽东主席在北平写了“奋斗”的题词勉励蔡楚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电影事业的领导工作，仍与陈残云、王为一合作编导了电影《南海潮》，成为第三届影片“百花奖”获票最多的影片。

可是，这位为中国电影发展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家、活动家，仅仅是读过四年私塾而已。他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在电影创作方面，能闯出一条路来，完全靠他勤奋好学，苦干实干的结果。

从小勤奋好学

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日，蔡楚生出生于上海，六岁那

年，随父母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省潮阳县神仙里村。一九一八年刚满十二岁的蔡楚生，仅仅在村里读了四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离家四十多公里的汕头市，在一家经营中外杂货的店铺里当“小公司”（学徒）。他每天起床后就扫地、倒痰盂，开铺门、为老板煮茶、接待顾客，随时听老板的使唤，终日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从小聪明好学的蔡楚生，在一天劳累之后仍不忘学习。他利用店里货箱中的旧报纸作教材，认真地学起来。他特别喜爱其中的文艺专栏。如果在学习时遇到有不识的字、不懂的词就去请教“哑先生”（查字典），直到弄懂为止，从不囫圇吞枣。渐渐地，他的学识丰富起来了，视野开阔起来了。从此，他对文学、戏剧、绘画和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二五年，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蔡楚生参加了店员工会的活动。当时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是个英俊潇洒的“小生”。他参加了工会组织的“进业白话剧社”，在参加创作和演出的活动中，显示出了他出色的表演才能。次年，适逢上海华剧影片公司来汕拍摄外景，蔡楚生随“进业白话剧社”的同仁们协助他们工作。电影艺术的魅力吸引了蔡楚生，由此，他萌生了对电影的浓厚兴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蔡楚生因在汕是从事工会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引人注目，为了避避风头，不得不搭轮船离开汕头前往上海。

好不容易才与电影攀亲

蔡楚生来到上海，心想能在电影制片厂找个工作，一来可为自己找个“饭碗”，二来希望将来在电影事业方面有所

作为。可是，这时他毕竟还是个无名小辈，要在这方面找个
工作谈何容易！他跑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制片厂，都吃了闭门
羹。不久，才通过了在汕拍摄影片外景的华剧影片公司朋友
的帮助，在该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场记、置景。这时，他如
鱼得水，每日里认真工作，刻苦钻研电影艺术，努力学习
绘画、书法，学写杂文。第一篇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的杂
文《水银灯下的奇女子》在《新银星》发表了。这是蔡楚生刻苦
自学结下的第一个硕果！

一九二九年，蔡楚生认识了同乡郑正秋（潮阳县上盐汀
村人）。郑是我国早期电影创作的拓荒者、著名导演，当时
他正在明星影片公司任导演。他发现蔡是个才华洋溢，精明
能干的青年，于是毅然介绍他加入当时上海影业中规模最大
的明星影片公司，并担任他的副导演。蔡楚生得到了前辈和
名师的指点，进步很快。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协助郑正秋摄
制了《战地小同胞》等六部影片。在这段时间，蔡楚生倾注了
不少心血，而且通过了实践，也学到了不少电影创作的经验。

是共产党领他上大道

一九三一年蔡楚生经电影界著名导演及摄影师的推荐，
加入了联华影片公司，正式担任编剧和导演。这段时间，他
独立编导了《南国之夜》、《粉红色的梦》，还创作了一个
电影剧本《春潮》。《南国之夜》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
主义的思想色彩，但却有脱离人民大众的倾向；爱情片《粉
红色的梦》的思想格调更比前者低下，在艺术上竭力追求
“诗般的幻梦”和“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优美抒情”。因此，
这两部片上映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的激

烈批评。当时的中共党员夏衍、田汉、王尘无等都给他很多的帮助。中共党员、著名电影音乐家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批评文章，说这两部片是“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恳切地希望他“不要再作艺术家的迷梦”，“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蔡楚生是个明白人，也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艺术家，他虚心接受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并亲自登门到聂耳家，倾听他的批评意见。两人互吐肺腑之言，肝胆相照，并结成了真挚的朋友。在左翼电影工作者的真诚帮助下，使蔡楚生清醒了头脑，端正了方向，认识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决心同广大群众接触，作为大众所有的作家，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一九三二年二月，他参加了左翼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蔡楚生被共产党领上了一条全新的创作大道！

梅花香自苦寒来

自从蔡楚生参加左翼电影运动后，他沐浴着霞光，进入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进步电影运动的行列，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一九三三年到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后编导了《都会的早晨》、《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王老五》、《小五义》等几部影片，导演了影片《新女性》，还创作了电影剧本《飞花村》，短剧《为自由而战》、《恋爱三部曲》等七个。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旺盛期。

艺术的事业是献身的事业。蔡楚生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了准确和生动地创作一部反映苦难儿童的影片，他不怕脏，不怕臭，不怕丢面子，毅然深入到流浪儿童中间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同他们交知心朋

友。开始他买东西送给他们吃，以取得好印象。可是他们对蔡楚生的感情仍格格不入，认为蔡楚生是个有钱有势的“阔佬”，对他信不过。蔡楚生觉察到自己同这些流浪儿童在思想、生活和感情上有距离。于是，便改穿起破烂的衣服，和他们无拘无束地混在一起，一起谈笑，一起玩耍，给他们讲有趣的故事。不久，他终于同他们交上了知心朋友，孩子们纷纷对他诉说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诉说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一切，表达出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这样，蔡楚生不但深入地了解到这群流浪儿童辛酸苦难的生活，也较细致地观察到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掌握了他们的个性语言，从而，创作得心应手，在银幕上塑造一群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真切动人的流浪孩子。

蔡楚生在拍摄电影时，执着地追求艺术的真实和自然。当《渔光曲》开拍时，为了增强影片的真实感，他带领摄制组的成员，乘船到浙东象山县的一个渔镇——石浦去拍外景。这里面临东海，既是渔船会集之地，也是海盗经常出没之处，随时都会碰上危险，再加上酷暑天，演员水土不服，病倒了，拍摄工作碰到了诸多困难。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工作，他也累病了，但仍带着虚弱的病躯坚持工作，直到拍完了他所计划拍的一切外景，才疲惫不堪地离开了这个渔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由于蔡楚生在《渔光曲》的编导过程中，绞尽脑汁，流尽汗水，终使这部影片上映后轰动国内外影坛，创造了中国影片连映八十四天的最高纪录。

拳拳赤子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先后成立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

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蔡楚生都被选为这些协会的理事或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当时的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被日军占领。蔡楚生在日寇的追捕下离开上海，转赴香港，继续开展抗战电影工作。

蔡楚生抵达香港后，同当地粤语电影工作者广泛接触，了解和分析研究香港当时的电影状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表了《战后的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一文。这篇文章洋溢着蔡楚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战斗性很强，对促进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转变，对于香港电影事业纳入抗战的正确轨道，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段时间，他和司徒慧敏合作创作了粤语电影剧本《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自编自导华语片《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

在蔡楚生和其他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推动下，香港的电影界表现出较高的爱国精神。粤语电影工作者也制作了一批进步的、严肃的影片。香港沦陷后，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回内地参加抗战工作，一部分则转赴南洋经商，没有一个影片公司同敌人合作，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建立敌伪电影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重雾中见阳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沦陷，侵港日军日夜派人搜捕积极拍制抗日影片的蔡楚生，为了避过日寇的搜捕，蔡楚生夹杂在难民队伍中逃到了桂林。他在桂林呆了两年多的时间，住在环湖边一间潮湿的破屋里，过着贫病交加

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四月，他以肺病之躯完成五幕大型话剧《自由港》。剧本刚完成，蔡楚生便因肺病恶化而躺倒。共产党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发动社会友好济助，才使他住进医院，得到一定的治疗。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寇沿湘桂路进犯衡阳，桂林岌岌可危，蔡楚生转移到柳州，住在四壁透风的柳州中学。不久，战火烧到柳州，他只好抱病夹在长长的难民队伍中，再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甚至几乎为此而丧生。在这坎坷的逃难道路上，他亲眼看到一批批难民倒毙在路上，听到挣扎在死亡线上婴儿一阵阵令人撕肺裂心的哭声……。经过了七八个月，蔡楚生终于到达了重庆。这时，他除身边留下两本《辞源》之外，早已一无所有。亏得好友的帮助，他才找到了一个暂时安身之地。但当时他看到的重庆，一方面仍是一群群难民在街头行乞，另一方面是少爷小姐、老爷太太们如痴如醉地在舞池里搂抱狂舞，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在盘算着如何升官发财……如此的“大后方战抗中心”，真叫他失望极了！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重庆期间，他有幸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政治家——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工作同志。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那种全心全意为祖国、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有了十分亲切的感受。他认真地学习了周恩来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邀请，观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使他看到了富有朝气和生命力的解放区文艺，更引起他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运用文艺这个武器，跟上前进的时代步伐。

战后中国电影发展的里程碑

日寇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蔡楚生和阳翰笙、史东山一起，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回到了上海建立进步的电影基地。一九四六年六月，他们会同了郑君里，孟石谋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成为了战后党所领导的进步电影运动的最重要基地。一九四七年与昆仑公司合并为昆仑影业公司。这时的蔡楚生，正如电影评论家、作家蔡洪声所分析的：“由于他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因而在其创作中，也就实现了由‘现实主义’向‘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飞跃。这个时期的作品，不仅保持了他过去创作中的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暴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被奴役人民的痛苦，喊出他们心底的呼声……，同时，又溶进了革命的现实主义血液，真实地表现出生活的革命发展——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就这样，在这段时间，他与郑君里合作，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这个时期的历史生活，鼓舞起人们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献身的革命热情。这部影片在上海上映三个多月，观众将近八十万人，是继《渔光曲》之后，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最高的纪录。远居香港的夏衍等七位著名电影评论家，联名发表文章，盛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出世，“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路标”。是同一时期世界上优秀的电影之一。

天亮前的战斗

上海解放前夕，为了避免反动派在死亡末日以疯狂的手段迫害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蔡楚生在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于一九四八年底再度抵达香港。他和阳翰笙，欧阳予倩、史东山、于伶，张骏祥等先后在抵达香港后，即会同原来在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再次展开了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组织进步的影人组织——“粤语片推进委员会”，并由蔡楚生任负责人，还有“粤语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旅港国语片联谊会”也相继成立，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壮大进步电影力量，改变香港电影的落后面貌。在港期间，蔡楚生积极争取了进步的“南国影业公司”合作，由他监制，由陈残云编剧，王为一导演，摄制一部揭露抗日胜利后反动政权同封建势力勾结一起残害农民的《珠江泪》。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和进步舆论的热烈欢迎。

一九四九年五月，他离开香港抵达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参加七月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致力于新中国的电影发展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楚生主要从事电影事业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一九五二年曾到布拉格、哥特瓦尔德等地参加捷克人民电影节。一九五六年曾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瑞士、法国、英国、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同年四月，他实现了

多年的愿望，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自从他担任全国的电影事业领导工作以来，以多病之躯，忘我的工作，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他非常注重抓影片的创作，对剧本的编写和影片的生产，总是一丝不苟地提意见。同时，他还十分重视电影理论研究和电影的评论工作。他亲自主持和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对一些电影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个时期，他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理论、评论文章和影事回忆录，这些是我国电影理论中的重要著作。

一九五八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建立，蔡楚生邀请陈残云、王为一共同编导，把十九年前写成的电影剧本《南海风云》重新构思，改为《南海潮》。一九五九年，虽然他体弱多病，仍然坚持带领创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渔村体验生活，调查、访问、搜集素材，至一九六三年春天，《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完成上映。上映后获得了观众和专家们普遍好评。

对家乡戏关怀备至

蔡楚生不但是著名的电影艺术家，而且对自己的家乡戏——潮剧怀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三十年代，潮剧界著名剧作家谢吟，随三正顺戏班赴上海作营业性演出。蔡楚生得知谢吟已把他的电影剧本《迷途的羔羊》改成潮剧的文明戏，就主动登门拜访谢吟，研究如何把剧本改好，切磋如何编好抗日进步戏，使谢吟十分感激。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广东潮剧团两次在北京演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去广州为招待外宾演出，他都蒞场观看。当潮剧首次到京演出时，他高兴极了，他介绍自己从小

就是“潮剧迷”，“现在相隔三十多年未曾看过潮剧之后，在北京有机会重看到我们的乡亲们，看到我的亲人们，看到我曾为他们的受苦而流过眼泪的亲爱艺人们，我内心的激动是没有适当的文字加以形容的！”他先后用三个夜晚的时间，观看了《扫窗会》、《陈三五娘》、《苏六娘》等几个剧目，并撰文发表《小谈潮剧〈扫窗会〉》、《漫谈〈苏六娘〉》等文章，用热情、亲切、生动的语言赞美潮剧，颂扬艺术表演娴熟的潮剧艺人，向潮剧的艺人们表示亲切的欢迎。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广东潮剧院去广州为招待外宾演出，陈毅副总理陪外宾观看演出。蔡老是第二次观看了《芦花会》。潮剧团的领导，根据陈毅副总理对该剧提出的意见，特邀请蔡老为该剧目进行修改，蔡老欣然接受。次年一月初送去剧本，至一月二十一日修改稿便送到潮剧院。蔡老在这个本上动笔修改的台词共有四十一处。每字每句都凝注着对潮剧的无比深厚感情。

人民永远怀念蔡楚生

在完成《南海潮》的拍摄任务后，蔡楚生被召回京参加一系列的学习和政治运动。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他主持的第二届影片“百花奖”授奖大会的联欢晚会上，周总理问蔡楚生：“你这个电影协会主席当得怎样？通过‘百花奖’要创造更多的各种题材，多样风格的好影片，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啊！行不行？”蔡楚生爽快地回答：“有了正确的领导，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看我们的行动吧。请您下次再来参加‘百花奖’的联欢会！”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是蔡老的六十寿诞时，他写诗